

孔子史学思想评述

谷玛利

内容提要 孔子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内容是以中原华夏族为正的正统观念和以周王室为尊的正宗观念,因此其政治倾向是守旧的、复古的、消极的。但是孔子一生史学活动丰富,他多方求问,实地考察,研读典籍,深入思考,对于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客观规律以及历史进程中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观点,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此外,孔子致力于整理和编修“六艺”,使之成为儒家经典,对于继承和传播古代文化思想贡献巨大。

关键词 史学 周礼 蛮貊之邦

谷玛利,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210036

孔子为了实现“吾其为东周”的政治理想,一生奔波鞅掌,四处周游,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曾放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这种政治自信主要来源于他对历史的认知,因此孔子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孔子标榜自己对于历史的基本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然而他在阐述自己思想观点时常常以评述历史、臧否人物的方式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他的政治倾向和史学观点。此外,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设帐授徒,以诗书礼乐教,并且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和编修古代典籍,史学成就令人瞩目。

孔子史学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为私”的混乱局面,孔子苦苦思考,上下求索,他在现实社会中寻找不到出路,转而在古代社会中去寻找答案,最终把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确定为推行“文武之道”、“周公之礼”,即恢复西周盛世的礼制秩序。孔子认为,古代社会典章制度完备,统治秩序井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这是“天下有道”;春秋末年,国家权力逐渐下移,传统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语历史事件研究”(15LSD001)阶段性成果。

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情况，这是“天下无道”（《论语·季氏》）。为此他提出“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的政治主张，要求以古正今，以礼正乱，以“有道”正“无道”。孔子晚年“喜《易》”、“作《春秋》”，思维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极大的拓展和延伸，因此可以从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来审视历史，理性分析。他通过古今社会比较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同”和“小康”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概念，他把古代社会称作“大同”，其基本特征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把当今社会称作“小康”，其基本特征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社会发展从“大同”到“小康”，人类文明已经全面倒退，从表象看是人心由“公”而“私”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但实质上是社会制度由“大道之行”而“大道既隐”的本质变化。何谓“大道”？孔子进一步作出说明：“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由此可见，“礼”是关乎到“大道”行与隐、国家治与乱的决定性因素。从孔子“喟然而叹”中可以看出他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对“三代之英”的崇拜，他认为人类社会要重返“大同”，就必须以“仁”来矫正人心，以“礼”来规范言行，其实这是一条复古主义的路线，代表了孔子在政治立场上的保守倾向和史学研究中的错误认知。

孔子为了推行礼制，拯救颓世，从古代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精心为当政者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政治蓝图，并四处游说，积极推广。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上古时期的“大同”社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旦这些历史条件不复存在，“大同”也就成为一个虚妄的泡影，在现实社会面前随时都有可能破灭！由于孔子对于历史的认知错误，导致政治思想脱离实际，趋于保守，政治路线也走入复古主义的死胡同，尽管他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坚定信念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坚韧精神，但是他在现实政治中总是屡屡碰壁，终无所试，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春秋时期，天命观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们相信冥冥之中的“天”或“命”决定人的祸福休咎，左右人的前途命运。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由“天”或“命”主导的：“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尚书·召诰》）孔子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无法摆脱社会主流意识的制约，所以《论语》中关于“天”和“命”的言论很多。但是孔子思想开明务实，治学严谨踏实，他在探究历史发展动因时，对于“天”或“命”之类的神秘力量基本采取“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审慎态度，而对于人为努力的作用则格外关注，他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上古帝王（尧舜禹）能够实施有效统治，推动历史进步，并不是完全听命于“天”的结果，“则之”、“不与”、“无为”等施政策略和措施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孔子对于历史认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探究到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客观规律等内容。

孔子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广闻博识，而应在总结和归纳诸多互不统属历史现象的基础上，形成对历史演变进程的整体认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嬗递，典章制度虽然有所损益，但所损益者不过是“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论语·卫灵公》）或“夏松”、“殷柏”、“周栗”（《论语·八佾》）之类的皮毛而已，关乎社会本质的“礼”则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由此他得出“百世”之后尤可知之的结论。他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杞和宋是夏商后裔的封国，这两个小邦国

在春秋诸侯争霸局势的挤压下已经名存实亡,遗存的典章制度也已“不足征”,然而孔子仍然能够从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中推导出“夏礼”和“殷礼”的主要精髓(“言之”),体现了他以政治家的眼光研究历史的独特方法和独到见解。

同时孔子也注意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在孔子看来,西周时期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顶峰阶段。西周盛世的国家典章制度之所以如此尽善尽美,主要是商周二代对于前朝礼制有所“损益”的结果。所谓“损益”,就是根据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在政治制度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合理的安排,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继承与创新。当然,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继承与创新就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典章制度日臻完善;另一种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对于两种不同的结果,孔子自然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不论孔子对历史进程作出何种取舍和评判,他都坚定地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相互统一的过程。尽管孔子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继承与创新看作是一种“百世”之后也不会发生本质变化的机械运动,但是这种考察历史发展、把握历史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孔子研究古代历史,非常注重经世致用,因此其史学思想具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显著特征,这与儒家学派一贯倡导的积极入世精神是一致的。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进”与“退”两个方面,进则治世,退则立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所谓“立身”,就是通过学习古代典籍和历史知识来提高文化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因此孔子一再申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如果一个人不学习《诗》《书》《礼》《乐》,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就如同面壁而立,既一无所见,又寸步难行;如果他能够认真学习和研究古代典籍,不断从历史中获取知识,汲取智慧,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就能自觉遵从“文武之道”、“周公之礼”,苟有所言必合乎道,苟有所行必不踰矩,道德修养也就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所谓“治世”,就是发扬光大“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通过“克己复礼”来规范人们言行,重建礼制秩序。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无论是主动的“爱人”还是被动的“易使”,都离不开“学道”,可见倡导仁学、推行礼制对于“大道之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礼记·经解》中,孔子把古代典籍化民从善、治世安邦的作用吹嘘得更是神乎其神:“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孔子看来,《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就是“治世”的万应灵药,现实生活中“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之类的僭礼行为,只要药到,没有治不了的!

二

在孔子史学思想中,以中原华夏族为正是的正统观念和以周王室为尊的正宗观念是两个最重要的史学观点,也是构成孔子政治思想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正统观是中国史学思想中的特有观念。古代历史上的正统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朝代更迭和民族融合,“正统”的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春秋时期,正统观大抵以区域划分为主,具体指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部族联盟,而周边四方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属,统称“四

[1]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把各种历史正统观概括为“得地之多寡”、“据位之久暂”、“前代之血胤”、“前代之旧都”、“后代之所承”和“中国种族”等六类。春秋时期的历史正统观应属“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夷”。这种正统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鲁僖公时期,鲁国曾发生“祀爰居”事件。“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平时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三日不飞,引起国人恐慌,当时鲁国执政国卿臧文仲鼓动国人前去祭祀,然而公族大夫展禽认为“祀爰居”违反了“圣王之制”,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等历代帝王圣贤,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展禽这里列举的一长串名单就是当时人们公认的“正统”(《国语·鲁语》)。孔子也曾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礼记·礼运》)这份名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在孔子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因为这是历史的“正统”,不容撼动!由于历史的局限,孔子错误地把我国古代历史局限在中原华夏民族的范围内,他对于“历史”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夏商周三代嬗递,而周边各族都是野蛮落后的蛮夷之邦,他们既不懂礼仪,也不讲忠信,根本没有什么历史可言。在这种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孔子极力贬低和排斥周边经济和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的异族,声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要求设立“夷夏之防”,这种居高临下的民族优越意识时常会在他的言论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泛指散居在淮、泗之间的淮夷各族,经济和社会形态相对落后。孔子认为自己与其留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无所作为,不如到那个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去过简陋平庸的生活!而且他坚信道德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感化文化落后的九夷,所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显然,在“子欲居九夷”的伪命题中,“九夷”成为他抨击现实社会的一个反面参照。《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里,行乎哉?’”在这里,“蛮貊之邦”又成为他考察“忠信”、“笃敬”等道德修养的一个反面标准。

孔子在臧否人物时也秉持以华夏族为正统的史学观点,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为维护华夏族正统地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推崇备至。弟子子路、子贡都曾依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的历史事实,对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的管仲提出质疑,认为他“未仁”。然而孔子认为“管仲相齐桓,霸诸侯,一匡天下”,历史功绩卓著,更重要的是管仲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中原诸侯各国“存邢救卫”、救北燕,对于保卫中原地区华夏族先进的经济与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和蹂躏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并特许之以“仁”(《论语·宪问》)。

孔子以中原华夏族为正是的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是消极的,至今我们对于我国上古社会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华夏族的范围内,以及后代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一贯持以轻视态度等等,除了这些民族自身经济和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等原因外,恐怕与孔子对周边别族文化所持的排斥态度不无关系。

以周王室为尊的正宗观念是孔子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周王朝在政治上实行族权与政权同一的宗法制度,在礼制规范下,社会等级森严,尊卑贵贱有序。孔子深入研究周代历史后,提出通过强化族权来强化政权的政治主张,并逐步形成以周王室为尊的正宗观念。孔子认为,周王室是天下“正宗”,周王是天下的共主和宗法的大宗,因此周王的至尊地位必须维护,不可动摇,“礼乐征伐”必须由周王实施,不容僭越。为了标榜周王室的正宗地位,他在编修《春秋》时特意在每年编年开始郑重其事地写下“春王正月”,以正天下视听。在这种正宗观念的支配下,孔子对于周文王开创的西周盛世(“文武之道”)和周公创建的礼制秩序(“周公之礼”)顶礼膜拜、无比向往,他动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盛赞“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他曾公开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认为,西周礼制是周公等人在借鉴夏商二代执政经验基础上而创建的一套完备有效的国家典章制度,周礼的核心是通过建立等级制度,维护礼制秩序,最终达到“尊王”的政治目的,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应该大力推行。

以周王室为尊也是孔子评判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和比干都是殷商王室的重要成员,他们勇于背弃昏庸残暴的商纣王,或去,或狂,或“谏而死”,孔子站在以周王室为正宗的政治立场上给予他们高度评价,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齐桓公图霸不忘“尊王”,他率师征讨卫国,取胜后“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陈兵楚国边境,问罪楚王“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主持葵丘之盟,按照诸侯觐见周天子之礼会见周王特使,自己谦称“小白”,下阶礼拜,登堂受赐,对周天子表现得毕恭毕敬(《左传·僖公九年》),因此孔子评价他“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相反,晋文公不能恪守臣道、尊崇周室,他在主持践土之盟时居然使用诡诈的手段召周天子前往,故而孔子评价他“谲而不正”(《论语·宪问》)。后来孔子在编修《春秋》时,为了维护周王室的正宗地位和周天子的至尊权威,对这一历史事件又进行了技术处理,将“晋侯召王”改成“天王狩于河阳”,并且发论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董狐是晋国史官,他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礼制秩序和君臣名分,敢于真实记录晋国国卿赵盾弑杀国君的叛逆行为,孔子对他也作出高度评价:“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礼制崩坏,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蹙国百里,失去号令天下的权威,沦为争霸大国的附庸,然而孔子不顾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仍然固执地坚持以周王室为尊的政治主张和史学观点,把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文武之道”、“周公之礼”作为一种固定的社会模式和政治的终极目标,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奔走呼号,孜孜以求,甚至还提出了“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复古主义路线,这在现实政治中显然是行不通的。

与孔子正宗观念相联系的是英雄史观。孔子认为,历史的辉煌都是由古代圣贤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英雄,所以他对“三代之英”和文武周公等人无比景仰,高度赞扬:“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甚至还发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感叹。在孔子眼里,这些历史精英都具有非凡的经历和困苦的体验,他们不仅品德高尚,富于智慧,而且富有献身精神,因此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可见在孔子英雄史观中,民众并非是依附于英雄的消极力量,英雄也不是与民众对立的反动力量,英雄与民众应该是共同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英雄不仅是民众的领袖,更是道德的楷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英雄史观其实是儒家“德政”思想的翻版。

三

孔子“信而好古”,他对古代典籍和历史知识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史学活动也非常丰富。早在孔子初仕时,入太庙助祭,对太庙中的礼器陈设、来历以及相关礼仪规制等问题“每事问”,因而受到“或”的质疑(《论语·八佾》)。孔子27岁时,蒯子来鲁国朝聘,孔子专门去拜访他,虚心向他请教东夷部族职官设置的有关知识。蒯子知识渊博,口若悬河,令孔子大开眼界,获益匪浅,后来他感慨道:“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35岁前后,鲁国发生“斗鸡之变”,鲁昭公被迫流亡齐国,孔子随后也到齐国寻求发展,他在齐国学习《韶》乐。《韶》乐最初是由帝尧时期成黑创制的,虞舜时期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成为宫廷舞乐,主要内容是歌颂上帝王让位于贤(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盛德。孔子潜心研究《韶》乐,食不甘,寝不安,痴迷到“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地步。此后孔子又到杞、宋等地考察夏商遗存文献和礼制,他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

之。”(《礼记·礼运》)孔子大约在41岁前后“适周问礼,盖见老子”(《史记·孔子世家》)^[1],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史学活动,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形成影响极为深远,遗憾的是目前史料对孔子“适周”的记载均过于简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可见孔子在周期间,对周公创制的国家典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周公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语·述而》)从孔子史学活动的轨迹来看,他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经过比较,最终把复古目标确定在西周初年。

孔子一生最重要的史学活动是整理和修订“六艺”,使之成为儒学经典(“六经”),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史学研究成果。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自汉以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经今古文学派相互扞斥,非此是彼,争论不休。其实孔子曾明确表明自己对于古代典籍的基本态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繁琐,只需运用内证方法,把关注重点放在“信”(古)、“述”(经)、“正”(乐)、“学”(易)等关键词语上,就可以明确孔子之于“六经”,主要是收集、整理、修订、研究和传承的关系。

孔子整理和修订“六艺”不仅仅是史学活动,也是他政治活动的延续。孔子在现实政治中郁郁不得志,所以不得不把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执着的求学精神倾注到设帐授徒和文献整理方面来,所以东汉王充说他“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论衡·问孔》)。孔子自己也说:“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显然,孔子这里所说的“艺”,绝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活动,而是与“道”、“德”、“仁”等重要政治理念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由此可见,孔子整理和修订“六经”,无一不因世道式微而缘起,又无一不以干世主正王道为归旨。

孔子整理和修订“六经”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他以深邃的史学见解、宏博的学术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纂和删修工作,对于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孟子把孔子在整理和修订古代典籍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历史上“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媲美(《孟子·滕文公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立场和历史视野的局限,孔子在整理和修订古籍过程中,淘汰、删除了一些不可“施于礼义”的内容,致使这些古代文化典籍失传、亡佚,如《国语·楚语》中提到的《世》《令》《语》《故知》《训典》等书,《孟子·离娄》中提到的“晋之《乘》,楚之《杻杙》”以及《墨子》中说的“百国春秋”等等,这些书均不见于孔子之后的文献中。即使那些经孔子审定后成为儒家教学的经书,也出于政治的需要,有些内容被修正或篡改,渗透了许多儒家道德说教的成分。至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这块金字招牌,肆意歪曲、附会古代典籍的内容,以达到愚弄民众的政治目的,其影响就更为恶劣。

[责任编辑:肖 波]

[1]关于孔子“适周”的时间,来说法不一,本文采用杨义《论语还原》中的说法——杨义:《论语还原》(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1页。